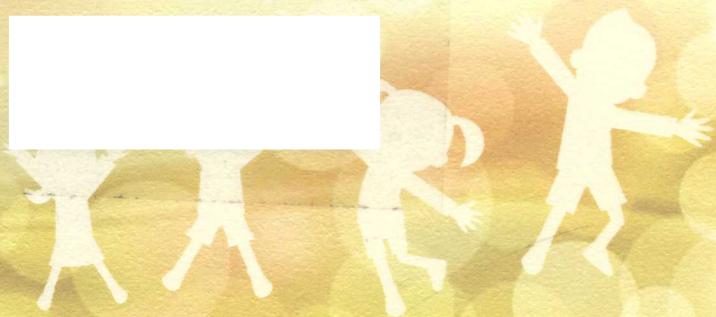


何夏寿
著

一部中国式的《爱的教育》

何夏寿
散文精品

爱满教育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一部中国式的《爱的教育》

何夏寿

著

何夏寿
教育散文精品

爱满教育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满教育 / 何夏寿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5444-6598-4

I . ①爱 ... II . ①何 ... III . ①小学教育—通俗读物

IV.①G6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9979号

责任编辑 杨文华 朱丹瑾

封面设计 周 亚

爱满教育

何夏寿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o

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 123 号

邮 编 200031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13 插页 1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6598-4/G·5431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爱是最高级的教育(序)

方卫平

我与何夏寿老师相识多年,三年前知道他开始写散文,而且写得很好。第一次读到他那篇写母亲的文字,我深为感动的同时,也颇有些惊喜。在我的印象中,夏寿是一位聪敏、勤奋、富有创造性的小学语文教师,我没有想到,散文里的他还有着如此细腻、动人的文笔和情思。

他的散文擅写人事,尤其擅长于普通的生活事件中书写令人难忘的性格与感人至深的情感。他不以文辞的华美吸引读者,他写母亲,写父亲,写姐姐,写身边的师长、同事或挚友,大多用的是很日常的笔墨。这些平白如话的文字,读来总是一派素朴,甚至不无朴拙之感。然而,就在这甚少雕饰的字里行间,却蕴含和传递着一份至为真诚的情感,并呈现出一份力透纸背的深情或思考。

很多时候,深深打动我们的正是这情感的内核。在《母亲,我的教育家》中,作者并不以高亢的笔墨大写母亲的形象,而是在一个目不识丁的乡村底层妇人最平凡的言行中,书写着一位母亲如何以其天性的善良和母性的本能,使“我”领悟到终身受益的教育真谛。《姐姐许到后门头》中的小姐姐,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邻家女孩,她的懂事,她对弟弟的护爱,都出自一个姐姐淳良而温柔的天性。也正因如此,她的那一记责备“我”“眼浅”的巴掌,以及那一句看似简白的“人



情一辈子”的告诫，才显出其尤为珍贵的纯朴。《老师领我进了门》《老乡金近》等文，写自己敬重的老师和长辈，话里话外一点儿不掩饰当年浓重的青涩与自卑。从作者的文字里，我们感觉不到一个作为特级教师回望来路的丝毫自得，倒是仍觉得，这仿佛还是当年那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向我们坦然诉说着这段温暖人心的记忆，他对长者知遇之恩的感激和铭记，也一如既往地单纯而真诚。

如果说在这样怀人记事的散文中，最打动我们的是那份厚重、深挚的亲情、师情，那么在《“俗人”不俗》这样的散文里，我们则看到了作家对于日常生活和人性的宽容洞察与欣赏。散文由校园和教师的寻常生活写来，将这一生活之“俗”叙写至淋漓尽致。然而，就在这俗极了的生活之中，作者看到并写出了俗世生活和人性“不落俗”的光华：稻粱谋中的责任意识，小急智中的磊落情怀，调笑背后的体贴温暖，不满之间的宽容释怀，等等。

窃以为，夏寿的散文其实也不无这样的“俗”味儿。从这些他名之为“教育散文”的篇什中，我们读到的不是有关教育与教育者的高阔辞令，而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或者说，一个常人——真实、寻常的世俗生活。他笔下的人事大多属于凡俗人生，就连叙写教师的生活，也毫不回避个中俗意。教师也是人，也要找工作，下馆子，唱KTV，也会为了世俗欲望和追求的得失而欢喜沮丧……然而，可贵的是，作者能从这“大俗”中见出、写出某种“大雅”的蕴含。不论生活多么难以免“俗”，我从夏寿的散文中感受到的总是人生的豁达、人心的淳善以及人情的温暖。很多时候，生活愈是落俗，那孕育和留存于其中的脱俗的光芒，愈是使人感叹而振奋。正因此，他笔下的这些人事读来总是如此亲切平实，朴质无华，又常饱含令人震动的力量。

夏寿所说“教育散文”，其中的“教育”一词，我理解为情感教育。读者从他的文字中感受日常生活和人情之美，确乎是一种情感的荡涤。而这一情感的核心，说到底，还是人心中那份单纯的善念与爱。譬如“我”的母亲从她有限的乡土表达词汇中总结出的那句“只要对小人(方言，小孩子)好，书便可教好的”，譬如姐姐以其质朴的话语教

给“我”的那句“一块钱是用得光的，一个人情是一辈子的”。这些俗而又俗的语言道出的不是高悬于我们生活之上的大道理，而就来自于人的最平常、最真实的生活，但它所传递的善意与爱意，使这平凡的俗世生活拥有了一种自然、醉人的光彩，也使教育这一行当拥有了一份诗意、温暖的美学。

事实上，教育本身也是一桩由大俗中行大雅的事情。尤其对于那些最基层的教育工作者而言，崇高、神圣的教育精神标签有时未免显得过于遥远，更多的时候，他们的每一天与所有普通人一样，也为世俗生活的欲望和悲喜所缠绕，也经受着这一生活的各种塑造与考验。教育并非要求教育者抛弃这一世俗生活的权利，而是愿他们在世俗生活中仍能坚持“教育”一词最核心的精神，即将个体导向人的一种更好、更完整的存在状态。我们今天越来越意识到，在这一引导过程中，情感的陶冶和教育或许扮演着某种至为核心的角色。我猜想，这也是夏寿以“教育散文”命名自己这些文字的初衷之一。

一个多世纪前，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完成了著名的《爱的教育》一书。将近一个世纪前，同为上虞籍的现代作家夏丏尊先生将它翻译为中文出版。我以为，夏寿将自己的这本散文集题名为《爱满教育》，除了表达自己的教育理念、写作情怀之外，自然也包含了对先贤的钦慕致敬之意。《爱的教育》的意大利文原书名，中文直译作“心”，它的意思很明白，唯有教育者对孩子发自内心的“爱”，才是走向教育的最佳途径，也唯有那被唤醒的内心之“爱”，才是教育的最好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夏寿的这些散文在其真诚的情感书写中，也继承和延续着亚米契斯《爱的教育》的精神。

2015年7月25日夜于浙师大丽泽湖畔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第一章 亲情久久 / 1
母亲,我的教育家 / 1
戏文里的父亲 / 7
儿子如镜 / 16
嫁给教育 / 23
姐姐许到后门头 / 30
我的哥哥叫“强盗” / 37
第二章 童年的小摇车 / 47
我的摇篮 / 47
我真的没偷 / 55
拨快时钟 / 58
我真的会飞了 / 62
铅笔头 / 66
船到桥门总会直 / 71
我与戏文 / 78
第三章 师恩如山 / 86
我的老师周一貫 / 86
老师领我进了门 / 93
拔河 / 101
“我去说说看” / 106



第四章 有你真好 / 111

我的外接“主板” / 111

“俗人”不俗 / 120

长大还唱《泥娃娃》 / 130

老黄 / 135

第五章 亲爱的小孩 / 141

黄鳝黄了 / 141

“萝卜”回来了 / 149

天使不可以跟蛇玩 / 156

向“童话”致敬 / 164

第六章 收藏阳光 / 176

老乡金近 / 176

树根深深 / 185

“童话”永生 / 193

教育：生命的向善（跋） / 199

第一章 亲情久久



母亲，我的教育家

母亲去世快 20 年了，但我一直按照母亲的要求践行着教育，一刻也不敢懈怠。我爱母亲，不仅仅因为她是我的母亲，还因为母亲是我最最敬仰的——一个目不识丁，却具有高超情怀和诲人韬略的“教育专家”。

那一年——1979 年，我 17 岁，村小学要招一位代课教师。我刚刚高中毕业，一去试考，中了。母亲很高兴。

在我去学校上班的那天早上，母亲早早起床，为我请了灶君菩萨





(我们家乡参加新工作的一种风俗)。在菩萨面前,母亲一边化纸钱,一边对我说:“当老师说难很难,说不难也不难。只要对小人(方言,小孩子)好,书便可教好的。”

“只要对小人好,书便可教好的。”那时候,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母亲这一句平淡、朴素的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的嘱咐,竟包含、甚至囊括了无数中外教育家穷其一生写就的“爱的宣言”。

我领着母亲的“旨意”走上了教育的岗位。学校让我教语文,兼任班主任。为了多接触小人,待小人好,我还对学校领导说,我会唱歌,能不能让我再教一门音乐。事后,我知道,乡村小学的师资紧张得要命,有语文、数学老师就不错了。音乐、体育、美术等学科因为没有老师,连课也不开的。我主动要求,无疑给学校雪中送炭。幸亏我只会教音乐,如果说还会体育、美术、科学什么的,兴许校长会把整所学校的“副科”统统承包给我。

为了对小孩子好,我在语文课上,要求学生所有学过的课文必须会背会默;所有教过的歌,必须会吟会唱。可问题来了。唱歌倒没什么,不会唱的只是声音小一点,会唱的嗓门高一些;但学过的课文不会背的就是不会背,不会默写的就是不会默写。这不行,我对孩子们实施“关夜学”,背一个,放一个。有一次,一个孩子背课文背到日落月升,孩子的母亲照着手电来到学校。看到母亲,背不出课文的孩子“哇”地大哭起来。我去帮他擦眼泪,孩子竟狠狠地咬住了我的手,我用了好大的劲才挣脱了。孩子却乘机跑出了教室,投进了黑夜里。孩子的母亲说了句“何老师,你也真是——”,就没好脸色地转身就走。

我带着伤痛回到家。母亲看到我手腕上的大红咬印,问我发生了什么。我把满腹的委屈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后,一面揉着我的伤口,一面对我说:“其实,那小孩子咬你也是有道理的。”

“有道理?”我惊讶地问。

“你想想,叫你一天到晚又背又念,你会不厌烦吗?”

“你不是说要我待小人好吗?”

“那也不要强迫小人。会背的就背，不会背的可以读，再不会的让他跟你念。”母亲说到这里，拉起我的手说：“你看，手指头伸出来还有长短，哪能人人都会背的。”

母亲没有再说什么了，只是再次走进厨房，从锅里给我端上了热着的饭菜。我望着母亲，回想着母亲刚才所说的话，若有所思。

真的，在母亲的箱子里，找不到任何一张发给母亲的奖状、证书；在母亲一生的闲谈里，也从来没有迸出过一字半句教育应如何如何的专业术语。但母亲这位天生的“教育家”，在35年前，在我踏进教育岗位之初，以她朴素的语言，通俗地对我进行了因材施教的良好启蒙。时至今日，每每坐在装修精致、灯光摇曳、鲜花铺台、音响悦耳的会场里，聆听一批接一批教育专家变换着姿态给我们宣讲什么尊重差异、个性教育、以生为本、以学定教的教育思想研究成果时，我总觉得他们在复述着母亲35年前对我说过的话。

这天晚上，我辗转反侧，按今天的行话来说，我开始了自己的教学反思：什么是对小人好？小人需要怎样的好？怎样做才能真正促进小人好？语文课怎样上才是对小人好？……

第二天的语文课，我用了母亲教我的方法，对于教过的课文会背的就背；不会背的可以读；再不会读的，我念一句他跟念一句。这一招还真灵，到放晚学，50个孩子个个过关，心花大开。昨天咬我手的男孩也大声地读出了课文，显得很高兴，离开时还用他脆脆的嗓子对我喊“老师再见”。我忽然觉得班上的每个孩子都很可爱，而且都很聪明。

后来，我的语文课上，根据课文的内容，在快结束时，我有时安排给孩子们唱一首歌，有时讲一个故事，有时说一句笑话，孩子们显得特别开心。

我也更待小人好了。有一次，我上童话课文《小猫钓鱼》，我念完课文后，有一个孩子举起手，告发他的同桌在我念课文时，在做小猫吃老鼠的动作。我问原因，小男孩说，他听着听着，就想学学小猫捉老鼠的样子。我让他再做一次，那小男孩当众表演了。说真的，那小



孩子真是个天生的表演家,他表演小猫捉老鼠的动作实在太逼真了。一不做二不休,我索性让那小男孩走到黑板前,让大家学着他的样,学做小猫,配合着我的朗读。教室里乐“爆”了。就这样,我的教学生涯里,诞生了第一节读、演、讲一体化的童话教学课。课上完后,孩子们围住我,纷纷要求下一次语文课也要这样上。我问孩子们,除了小猫,你们还会表演什么。孩子们七嘴八舌:有的说会演猴子,有的说会学小狗,有的说会做小熊……孩子们为什么都那么喜欢演小动物,我陷入了沉思。

那时候虽然我不知何谓教育原则,更不懂得什么教育思想,但出于恪守母亲“只要对小人好,书便可教好的”的教育信条,以及实践母亲“手指头伸出来还有长短”的教育思想,我开始认定孩子与我们大人不同,喜欢学习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喜欢用他们所喜欢的方式学习知识。这为我日后实践、探索“童话教学”“儿童文学育人”奠定了矿藏式的心基础。

当然,母亲这位“教育家”,她高超的育人水平不仅仅只体现在她的教育“理论”上,更体现在她的教育行为上。

由于受母亲的影响,我的课越上越让孩子感兴趣,致使有好多孩子都不愿意放学回家了。上级教育部门看我教书还真有一套,让我这个代课老师转了正。母亲更高兴了。

20世纪80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的乡村里,有好多村民开始到大城市里去创业。家里的小孩子托给谁最放心,小孩子都对父母说要求能和我生活在一起。于是有家长找上我家,掩掩盖盖地告诉了这层意思。我还没有表态,母亲先开了口:“好的,好的。我儿子转正了,一辈子就教书了。你们出去赚钱好了,你们的小孩子就放在我家,我们会照顾好的。”

就这样,从1985年至1994年母亲去世,母亲先后成为我的8位学生的奶奶。

说是奶奶,主要是从母亲的年龄上说的。母亲生我时已经45岁了,我17岁走上教育岗位时,母亲已经62岁了。孩子们寄居在我家,

自然称呼我母亲为奶奶。但事实上，母亲为这 8 位学生所做的一切，却是母亲式的。每天为孩子做三餐米饭，为他们缝补浆洗四季的衣服，还要照料他们晚上睡觉，特别是孩子生病时还得送医院，等等。

记得有一天晚上，有一个跟我母亲睡一床的小男孩，半夜肚子痛得哇哇大叫。72 岁的母亲那几天也正咳嗽，但为了不影响我的睡眠，自己一个人背着孩子下楼，准备去医院。由于心急，母亲开门时不慎碰落了门闩，我醒了过来，才用自行车将孩子送到医院。而母亲一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步行了一个多小时，来到镇上医院看我们。见到我们第一句话便问：“痛止住了吗？”母亲一面劝我回家睡觉，一面帮正吊盐水的男孩揉着手腕。为了第二天能正常上班，我回家了。我把男孩留给了年迈的母亲。后来，那男孩告诉我，我走后，他吐了一地，奶奶又是帮他擦脸又是为他捶背，一直忙到天大亮。

一位跟孩子非亲非故的老人，一位目不识丁的老人，以她对教育独特的理解和实践，时时演绎着教育家般博爱、豁达的胸怀。

1994 年 5 月 26 日傍晚，因患食道癌处于弥留之际的母亲，用她微弱的声音问我：“你们学校明天要去镇里跳舞吗？”是的，前两天，我对母亲说过，这些天，我有点忙，为庆祝“六一”，镇小学要举行文艺会演，我们学校在排大型合唱节目。我是拉手风琴的，得一遍一遍地和孩子合。看着瘦得皮包骨头的母亲，想想母亲来日不多，能陪一天就算一天，我撒谎道：“镇里后来取消了。”母亲望着我，无语。

半夜，母亲突然呼吸急促，脸色惨白，我握住母亲的手，大声呼喊。但无济于事了，母亲的呼吸停了。那惨白，像流水一样从额角一下子滑落到眉头、鼻梁、唇角、下巴……

第二天一大早，我在母亲的遗体前拜了两拜，随着学校里的车去镇上参加“六一”会演。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家里死了双亲，子女至少在“头七”不能唱歌作乐。而我居然要赶剧场，而且还要弹琴。这无疑是对我母亲极大的不敬不孝。但我知道，我必须去的，这是母亲的意思。可能谁也不会知道——我们母子心灵相通。母亲之所以走得这样坚决，是因为母亲知道，她不走，我就会以“镇里后来取消了”的



借口，陪着她走得慢，甚至走不了；母亲之所以走得这样安静，是因为母亲想静静地聆听在儿子拉响的乐音里，孩子们清丽婉转的歌声；母亲之所以走得这样从容，是因为母亲完全相信，她已经把她的儿子引入了至真至善的教育航道，不管旅途是鲜花满天还是阴霾密布，她的儿子已经深深地懂得了“只要对小人好，书便可教好的”的内涵外延。

送别母亲的场面也很特别。除了我们这些母亲的亲生儿女、媳妇女婿、外甥内侄等亲亲眷眷，送行的队伍里，还有一大帮孩子，有上了大学的，有正在读高中的，也有挂着红领巾的小朋友。

母亲生前多次说过“不看少时出嫁，要看老来送丧”。母亲的意思是年轻时出嫁多少含有变数大、不确定之意，哪怕红妆十里、良田百亩都不足为荣，而老去后出殡的仪式，才是对一个人一生最好的评价与纪念。作为母亲的儿子，我深深地知道，在母亲长长的送别队伍里，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长，都是母亲用大爱与大善写就的作品；每一个叩头每一朵白花都是母亲最美的风景。母亲，一个从未上过学堂、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享受着这一份因“善对教育”而带给她的体面与尊贵。



戏文里的父亲

父亲故世时,我不到 16 岁。对于现在的我来说,35 年没有父亲的日子,是一段遥远的时光。但父亲艰辛不失开朗,精明不失豁达,憨厚不失睿智的形象,并没有因为这似水的时间渐行渐远,最终成为抽象的父亲;反而,因年岁的增长,尤其是自己经历了生活的历练之后,父亲的音容笑貌、举止言谈,甚至连父亲身上的气息,变得越来越真实而具体。

父亲出生于 1909 年,听父亲说,祖父留给父亲的遗产是一只祖上要饭的碗,上面钉了三个“瓣”(方言,意为碗上有铁钉将破裂处缝合起来)。

父亲没有进过学堂,但却识得很多字,这缘于父亲爱看戏文。更让我至今仰慕的是,父亲居然具有自由进出于戏里戏外的本领,能轻松自如地将戏里戏外的生活融会贯通,按父亲的话说“戏里故事,戏外做人”。学以致用,从而让我们这些父亲的子女不但能幸免于受冻挨饿,而且将我们兄弟姐妹中的我和大哥、二哥、二姐等四个,送入学堂读书,成为父亲引以为荣的“知识分子”。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我们村紧靠海边,自然以海为生。我家后门有个小天井(我们这里人对园子的称呼),约 20 个平方。朝阳的一面,一字排开的木板上晒着海盐。有太阳的早上,父亲将从海泥里滤出的卤水,倒在木板上,让卤水在阳光下蒸发,升华,结晶。背阳的地方,是一排大小不等的水缸,终年装着父亲和哥姐们从海里捞来的虾籽、泥螺。不出外做生意的日子,不管严冬酷暑,还是风霜雪雨,父亲一有空准会站在天井里,或在盐板前,或在水缸旁,看看这里,捣捣那里。每一块盐板,甚至每一粒食盐,都是父亲和哥哥姐姐们用心血和汗水写就的作品;每一只水缸,每一颗泥螺,都是父亲和哥哥姐姐们用风雨和晨昏描绘的画面。父亲与这个小小的天井,其深厚的感情,



远远胜似酋长与营寨，燕雀与暖巢。

虽说我们村里，家家户户都晒海盐，捕虾籽，捉泥螺，家家户户的男当家都在做这些海产品的买卖。但在那个恨不得全国人民只剩左脑左手的荒诞年代里，凡是经商，即使你做自产自销的买卖，也会被加以“搞资本主义”的罪名，而被割除“尾巴”。

我9岁那年，“割尾巴”风越刮越猛。邻居松根伯伯、郎定伯伯去杭州做生意，不但他们的泥螺被城管倒进垃圾箱，而且还落了个“投机倒把”的罪名，三年内再也不能进入杭州城。听着两位伯伯的家人抱头痛哭，父亲整整两天不说一句话。而此时，我小姐姐又得了重病，口吐鲜血，整天高烧不退，医生说再不治就性命难保了。母亲以泪洗面，跑转了整个村，才借到50元钱，勉强凑齐了看病的费用。

父亲扔掉抽了两天的烟袋，挑着满满一担腌泥螺去杭州了。第二天傍晚，父亲空着担回来了。正常情况下，父亲的一趟生意，大约一个星期，有时，长达十多天。这次，昨去今回，我们猜想父亲的泥螺

肯定与隔壁郎定伯伯一样，被杭州人倒掉了。父亲去卖的这担泥螺，约有一百多斤，是父亲和大哥、二哥、大姐、二姐等，整整半个月的起早摸黑，到海滩上一颗一颗捡来的，可卖 40 多元钱。可现在，只剩两只空桶……大姐伤心地哭出声来，母亲一劝，大姐的哭声反而更大了。而父亲却哈哈大笑，抽上一支烟，用长期对我们讲戏文的语气，讲起自己的这趟生意经——

昨天傍晚，我到了杭州拱辰桥运河边。这次，我不去市场，去“卖鱼桥”小巷。刚走进小巷，“卖‘吐铁’”（方言，指黄泥螺）三个字还没有喊出，一个戴红袖章的跑了过来。我吓得冷汗直冒，但马上我想到，冷汗不是潮水，冲不走他们的。我就把准备好的辣椒往两只眼睛一擦。然后倒在地上大喊肚子疼。那个戴红袖章的将我扶起来，见我这个大男人痛得泪水直流，吓得不知怎样才好，赶快转身去喊“救兵”。我趁机就将小桶担上底和下底抽出来对调了。

后来来了两个戴红袖章的男人。他们一个给我服“十滴水”（一种缓解中暑的中药），一个帮我揉肚子，还说要送我上医院。我见好就收，说好点了。两个戴红袖章的发现我卖的是大米（大米不属于贩卖行列），更觉得对不住我了。先发现我的高个子，看着我的生意桶，一个劲地摇着头感叹，说乡下人做点买卖真当罪过啊。我谢了他们，换了一条巷子，大喊起来：“卖‘吐铁’喽——”。杭州人喜欢吃腌“吐铁”，而这些天又严禁出卖，我刚好碰到空档，货少就奇，生意特别好做，一百多斤“吐铁”一个多钟头就抢光了，没买到的还后悔来迟了呢！

我们都听得哈哈大笑，为生意的成功，为父亲的智慧。父亲的脸上满是红光，连稀疏的白发也随着父亲的讲述而轻快地舞蹈。父亲，完全沉浸在广州那条小巷里，被男女老少抢购“吐铁”的得意与欣喜之中。

“爹，这担‘吐铁’一共卖了多少钱？”大姐急不可待地问。

父亲回过神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叠纸币，递给了一旁的母亲，不无喜悦地说：“67 块（方言，元），67 块啊！”